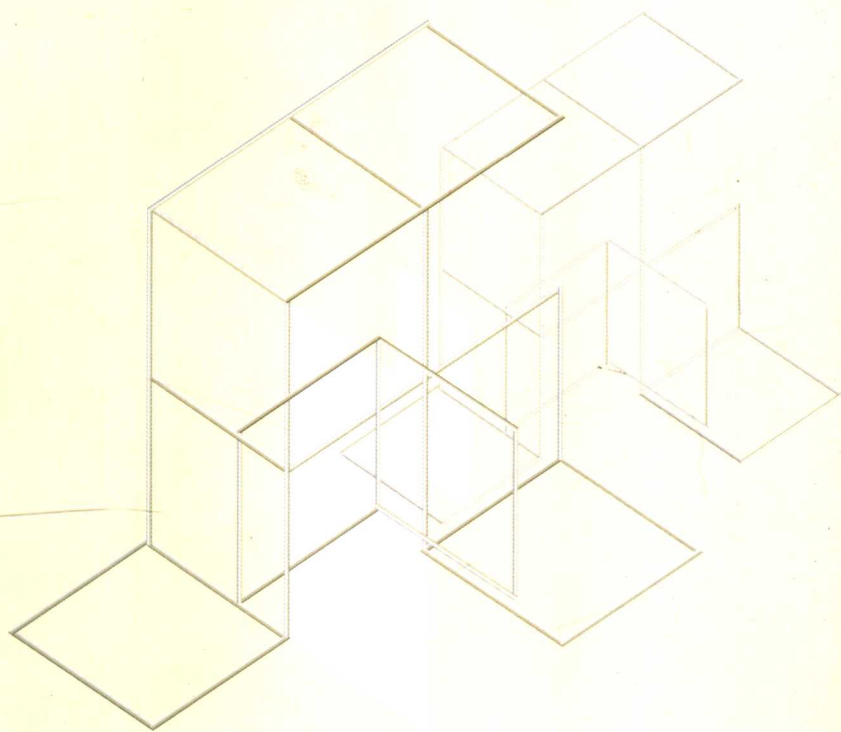


重建合法性

南昌市新生活运动研究

(1934~1935)

溫波著



學苑出版社

本书获得苏州科技学院出版资助

重建合法性

——南昌市新生活运动研究
(1934 ~ 1935)

温 波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运动研究：1934 ~ 1935/
温波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12
ISBN 7 - 5077 - 2795 - 5

I. 重... II. ①温... III. 政治运动—研究—南昌市
—1934 ~ 1935 IV. D693.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3588 号

责任编辑：刘 丰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9

网 址：www. book001. com

电子信箱：xueyuanyg@ sina. com

xueyuan@ public. bta. net. cn

销售电话：010-67674055、67675512、67678944

印 刷 厂：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厂

开本尺寸：850 × 1168 1/32

印 张：10. 75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1500 册

定 价：26. 00 元

序
Foreword

温波博士的学位论文《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运动研究（1934～1935）》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要求我以导师身份写一篇序。

新生活运动研究者不算很少，但从“重建合法性”这一角度来审视这一运动者，温波这篇论文可能尚属首次。

合法性概念源于马克思·韦伯，经过众多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的阐释，它已成为理论社会学及政治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他们认为，每一社会活动系统的存在，都由命令和服从构成。而任何形式的统治，只有当它能够有效建立起人们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仰、普遍信任或普遍认同时，它才能获得人们对它的命令普遍的服从。这种存在意义，即是统治合法性或统治的正当性。

中国国民党是在孙中山三民主义指导下，通过暴力革命，先是推翻清王朝统治，继而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打倒北洋军阀，而取得执政地位的。但是，在中国国民党即将取得全国政权地位时，蒋介石集团背叛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宗旨，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排除国民党中其他派系，建立了自己的独裁统治，并因此引发了新军阀混战，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红色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建立。在这一情况下，借助革命权威来确立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以治国治军的能力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成就来建立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可望而不可及。新生活运动，可以说，就是蒋介石试图依靠韦伯所说的“传统型权威”来树立自身“魅力型权威”，从而构建其统治合

法性的努力。

在马克思·韦伯那里，传统型权威所依靠的是人们对古老传统的神圣性以及实施权威者的合法地位的牢固信念。它通过将从祖先那里世代传承下来的规则神圣化、普世化，使人们无条件地服从这一传统的倡导者、维护者。在社会结构分化程度不高、社会相对封闭、血缘宗法及个人忠诚是联结社会主要纽带的传统社会中，这种传统型权威长时间占据支配地位，中国也不例外。然而，近代以来，这种传统型权威在西方冲击和中国自身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冲击的双重打击下，已经严重动摇。新生活运动要求以“四维八德”即礼、义、廉、耻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纲领，进行价值重构与道德重构，配合“五四”尊孔、读经，乃至恢复文言文，打的旗号是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传统美德。论文通过新生活运动倡导者们对这些道德规范所作的具体诠释，充分证明了，其实质，无一不是为了要人们心悦诚服地崇拜与服从国家元首、最高领袖，循规蹈矩遵守“国家纪律”。

在韦伯那里，魅力型权威以领袖人物的非凡才能为基础。然而，蒋介石并无这样的才能。新生活运动则被利用来制造蒋介石“非凡才能”的幻象。蒋介石本人亲自主讲《大学》、《中庸》，除大力鼓吹“四维八德”外，并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楷模，都是试图在传统型权威之外，再辅之以魅力型权威，建立自己双重的合法性基础。

温波博士这篇论文，通过 1934~1935 年新生活运动在其发源地南昌发动与推进的实际过程，非常有说服力地说明了这一重建其统治合法性的运动为什么必然以失败而告终。

重建合法性，首先要求他们倡导的“四维八德”这一价值体系或道德体系获得社会广泛认同。论文清楚说明，由于“四维八德”存在的基础是传统的家族宗法伦理秩序和君主官僚专制统治等级秩序，和近代以来已在中国社会深深扎下根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个性解放、革命革新等等背道而驰，

它必然导致在民众中认同的缺失。尤其是在接受新思想、新观念较多的知识层中，认同缺失更为严重。而当新生活运动依赖行政系统被强行实际推行时，国家直接干预民众正常生活，反而损害甚至引导了民众独立自主的生活权利，它当然更会引发民众强烈的排拒而只能流于某种形式的存在。当它成为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宣战和反攻的工具时，当它与对红色根据地的军事“围剿”相结合，成为文化“围剿”及文化专制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它更必然要遭到进步力量的强烈批判和有力抵制。这当是新生活运动虽倾注全力，轰轰烈烈，却收效甚微的根本原因所在。

温波这篇论文通过对南昌民众生活状况实际的具体分析，说明了当时民众真正的需要究竟是什么。新生活运动不去解决民众所迫切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它最终必然游离于民主生活之外，也就不奇怪了。

新生活运动难以解决国民党特别是蒋介石集团统治合法性基础重建问题，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和蒋介石集团也不敢将其合法性基础确立在韦伯所说的法理型权威上，即建立在遵守正式制定的非个人专断的宪法、法律、法规基础之上，建立在其权力受到民众有效参与、有效制约、有效监督基础之上，建立在不但为中国仍然存在的传统社会所认同而且为新的社会力量、社会阶层所认同的基础之上，使其权力从无限权力变为有限权力。这固然是中国社会本身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获得社会普遍认同原就极为困难，更由于蒋介石集团只是蒋介石支配下的整个国民党当时所代表的一个有着极为偏狭的实际利益的特殊社会群体，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将自己凌驾于整个社会和全体民主之上。

新生活运动自1934年2月开始，一直持续至1949年2月，前后整整15年。这一运动所涉及的地域范围，包括江西、江苏、浙江、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山东、山西、陕西、甘

肃、青海、宁夏、绥远、察哈尔、四川、云南、贵州、西康等省和上海、南京等市。温波的论文考察了南昌一地，时间又仅限于1934~1935年，但是，由于温波搜集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其他第一手资料，对于运动的发动、运动推进所依靠的真实理论以及运动推进的实际状况作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摒除了笼统的概念化的分析，力图将社会学、政治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关注历史细节，努力复原展示历史的真实，透过其论述足以了解整个新生活运动的必然命运。当然，它终究不能取代对新生活运动全过程以及其他所有不同地域的个案研究。

姜义华

2006年12月4日

P 前言

reface

1934年2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并成立了领导新生活运动的机构。在短时间内，其他各省市如南京、上海、江苏、河北、湖北、福建、安徽、河南、浙江、湖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四川、贵州、云南、西康等计20余省区以及江西省各县市，也都相继作出反应，发起新生活运动，并成立了类似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组织机构。因此，从范围来讲，新生活运动所达到的范围颇广。而且，新生活运动的推行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轰轰烈烈的现象。但是，从其效果来说，从新生活运动的发动到新生活运动最后衰落，它实际所起的影响力又是有限的，它并没有到达新生活运动发动者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通过对南昌市新生活运动的研究，我们也许会找到其中的答案。

(一)

笔者之所以选择1934~1935年南昌市新生活运动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同蒋介石发动的其他运动如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等相比较，新生活运动是历时最久（从1934年2月发起到1949年2月结束，长达15年），在国民党内影响深远的一次运动。^[1]但对新生活运动这样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在史学界中，新生活运动的研究长期不被重视。因此，就

目前来说,我国学术界对此的研究十分薄弱,还只是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为此,研究新生活运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而另一方面,新生活运动在民国史中并不单纯是一种社会运动,或如一些作者所称的文化运动,^[2]它的出现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产物,是蒋介石解决危机、摆脱困境的一种方法。问题在于,在当时国内外矛盾重重,民族危机严重之机,蒋介石为什么不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寻找解决危机、摆脱困境的方法,而选择发动新生活运动呢?新生活运动又是怎样发动起来的呢?蒋介石又是如何对新生活运动的理论进行建构的呢?新生活运动在实际过程中,民众是否对此认同?实际推行情况又怎样?靠那些人去推行的?是否达到了发动者的预期目的,是否帮助蒋介石摆脱了危机和困境?如果没有,原因何在?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中,通过对南昌市新生活运动的研究,将会提供一个个答案。

其次,之所以选择南昌市作为考察新生活运动的出发点,在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南昌为新生活运动的发源地,1934至1935年是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设在南昌的两年(1935年12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便迁到了南京),这两年,南昌新生活运动从发动到推广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因为它具有一定的理论,一定的组织机构,且这两年南昌新生活运动的工作相对其他省份来说,是做得比较好的,按照马毓英的说法:“新生活运动的推行,除了在南昌方面因有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直接领导,还做了一些工作。”^[3]因此,考察南昌这两年的新生活运动的情况,更能够进一步解释上述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二是从1934年的情况来看,由于围剿共产党的需要,南昌成为国民党政治活动的一个中心,蒋介石相当多的活动都是在南昌。因此,以南昌为研究新生活运动的出发点,更能够增加我们对民国历史事件的进一步理解。再加上通过对此研究多少能够反映当时南昌市社会的状况,可以进一步丰富史学界对研究薄弱的南昌城市史的研究。

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对南昌新生活运动的研究，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再次，长期以来，对新生活运动的评价莫衷一是。国民党内对新生活运动评价较高，将其作为“国家与民族的复兴运动”和“文化复兴运动”载入了国民党史册。^[4]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称新生活运动是五项建设的总运动，是今后社会建设的基础。（五项建设指三民主义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国防科学技术、地方自治与新生活运动）台湾学者也普遍对新生活运动的评价颇高，^[5]国内也有的学者对其也有较高的评价。^[6]但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大陆相当一部分学者对新生活运动持否定态度，而台湾学者大多数对新生活运动的缺陷避而不谈。在这些研究中，虽然不失其价值，但无疑都带有一定的偏见。因此，通过对新生活运动诞生地南昌这两年的研究，可以基本上看出新生活运动是否如评价者们所评价的一样，从而纠正学术界对此的一些认识。

最后，以史为鉴。作为一种在民众中推行的运动，新生活运动为什么没有取得其预想的效果？为什么没有达到发动者们的目的？新生活运动又为什么会走向衰落？通过对南昌市这两年新生活运动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其原因所在。而探索这一问题，它不单单是一个学术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为我们当今社会提供一定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政治上，对当政者来说，怎样做才能够符合人民的利益，取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南昌市新生活运动，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二）

对新生活运动的研究，最早是出现在一些学术著作之中。从60年代初《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到现在出版的一些近代史著作中，对此都进行了论述，如张宪文的《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刘键清等《中国国民党史》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张同新的《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郑德荣的《国共政权十年对峙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4月)等。这些研究主要是从整体上对新生活运动作一论述和评价,所使用的材料也十分有限,因而会得出片面的结论。如张宪文的《中华民国史纲》就认为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在于用封建的伦理纲常、四维八德,来整治人们的言论行动,使之摆脱共产主义的影响,以维护国民党的政治统治”。^[7]并且认为它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特点,它“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精神产物”。^[8]张同新的《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却认为新生活运动的产生源于蒋介石与宋美龄在江西看到很多青少年“衣服褴褛,蓬头垢面,精神颓丧,行动无秩序”,宋美龄认为这是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的根源,于是向蒋介石献策,开展新生活运动。^[9]该书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和目的,认为新生活运动的实质是中国封建道德和法西斯主义的手段与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方式捏合在一起的混合物,用来麻醉人民,使他们停止反抗。^[10]最为可贵的是,该书分析了新生活运动不能开展起来的原因,这些原因是儒家思想腐朽落后、人民要求实行民主停止内战、新生活运动的一些内容不切实际以及国民党自身贪污腐化。^[11]郑德荣的《国共政权十年对峙史》则认为新生活运动是在蒋介石内外交困的严重危机下而发起的,^[12]他对新生活运动的主旨、内容、目的、方法以及推行事项进行了论述,但他认为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和本质是“反动的,是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新生活运动的矛头“是对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这些革命根据地的”。^[13]这些研究都通行着一种习惯性说法,即认为新生活运动就其直接目的和主要内容来讲,是从精神方面“配合当时的军事剿共”,“禁锢人民的言论自由,使之摆脱共产主义的影响”,是用来对付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反革命谋略”,是为“巩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封建法西斯

统治”，并以此来扑灭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另外，这些著作对新生活运动真正进行的实际情况均未涉及，而且也未论及抗战以后新生活运动的发展情况。

一些思想史的著作对新生活运动也进行了论述。如宋仲福等著《儒学在近代中国》（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一书，从儒学与新生活运动的关系这个角度对新生活运动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新生活运动是以民族复兴为名，用古代的四维等伦理道德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行动，以反对共产主义运动。^[14]并认为蒋介石将新生活运动的核心内容“礼义廉耻”纳入了儒学之中，用儒学的伦理道德来解释它们。^[15]该书对新生活运动的内容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同时也指出了新生活运动收效甚微的原因在于理论与实际不一致。^[16]其他如林茂生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则将新生活运动归结为是推行法西斯主义文化教育，^[17]甚至有的提法是错误的，如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只有指导员而没有总干事一说，只有干事会主任这一职务。^[18]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将新生活运动归结为蒋介石的伦理思想的实践，该书很简单地对“礼义廉耻”作了解释，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史实错误，即他们认为新生活运动由陈果夫、陈立夫推向全国，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19]

关志钢的《新生活运动的研究》（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研究新生活运动的著作。该书深入研究了新生活运动发动的文化背景，认为新生活运动的发动，同中国固有道德、传统文化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具有浓郁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20]实际上是继承了“中体西用”论。^[21]并且他指出，新生活运动的主要理论依据，源自由戴季陶和蒋介石重新诠释过的三民主义。^[22]作者在分析政治背景时，指出了蒋介石面临的危机，而为应付危机，蒋介石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而“安内攘外”方针为新生活运动的推行提供了政策依据。^[23]该书还系统考察了新

生活运动进行的历史过程，并对新生活运动的基本理论作了分析，并对新生活运动的组织与人事，新生活运动的推行作了一些简单的论述。该书跨度长，从新生活运动的发起直到新生活运动的衰落，15年的时间都简单地进行了论述。但是由于跨度长，该书篇幅又不大，故对新生活运动并没有去深入地研究。在该书中，作者引用的材料仅是一些常见的材料，未见任何档案材料。由于引用材料的限制，因此在研究中难免也会出现一些缺陷。如并没有深入对新生活运动在实际的推行过程的情况进行考察，对新生活运动的理论也仅是按照《新生活运动纲要》所载进行简单的叙述，没有对其深入地分析。虽然作者在书中破除了以往一些学者用意识形态的方法对新生活运动的评价，但是他称新生活运动“在历史上地位之重要是显而易见的”，^[24]逃脱不了有拔高对新生活运动评价的嫌疑。同时，作者也没有对新生活运动的推行效果不好的原因进行分析。但不管怎样，该书还是开启了研究新生活运动之门。

而对新生活运动进行专题论文研究的文章，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到目前为止，研究的论文也不过只有十多篇。而这些论文主要是从多个角度对新生活运动进行研究。第一个是仍然从整体角度对新生活运动进行论述和评价，没有摆脱前人研究的框架。这一类文章有左玉河的《论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史学月刊》1990年第4期）、董文芳的《蒋介石与新生活运动》（《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刘红的《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民国春秋》1996年第6期）、仇晨的《国民党统治区的新生活运动》（《历史教学》1990年第3期）、林颂华的《试论新生活运动的特点与效用》（《江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赵凤珍的《论新生活运动》（《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0年第1期）、张岚的《国民党“新生活运动”评析》（《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白纯的《简论抗战之前的新生活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2

期)等。他们仍然认为新生活运动是为了实现国民党“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革命策略;^[25]是为了军事“围剿”,文化“围剿”和约束人们的行动;^[26]是一场统治者发动,借助“礼义廉耻”固有道德,配合蒋介石剿共反共防共和消除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政治运动。^[27]尽管如此,但和前人相比,已有所突破。一是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如林颂华的研究已涉及抗战后的新生活运动、赵凤珍在论述新生活运动的原因时已从多个角度去分析、特别是左玉河从传统文化角度论述了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根源;二是对新生活运动不再是全盘否定,林颂华、董文芳等人承认新生活运动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林颂华、白纯承认新生活运动的效用还是非常大的,肯定了新生活运动对抗战的作用。^[28]

关志钢的《试论新生活运动之缘起》(《深圳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一文,对史学界一般认为新生活运动是针对共产党这一观点进行了重新评定,他认为新生活运动发起的政治方面的原因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内外危机的情况下,“攘外安内”政策导致了新生活运动的出台,而文化方面的原因就是新生活运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动。^[29]同时,他还指出蒋介石所接受的传统文化的教育是发起和指导新生活运动的重要思想依据。关志钢另一篇文章《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生活运动》(《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已跳出以往学者整体论述和评价新生活运动的这一研究框架。他不仅论述了抗战时期新生活运动指导思想与服务宗旨得以调整的原因,而且还论述了抗战爆发后“礼义廉耻”内容的变化,从而进一步指出,抗战时新生活运动主要是为抗战服务。同时,关文还对此时的新生活运动的组织及其活动作了详细论述,他充分肯定了新生活运动在抗战时期的积极作用,并对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之间的关系作了一论述。

从思想史角度对新生活运动进行研究,研究视觉较前有很大的进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何友良的《论新生活运动与复

兴文化问题》(《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他从整个中国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着手,认为新生活运动是文化的复兴,振兴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曹艺的《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论析》(《民国档案》1992年第2期)一文论述了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关系,认为新生活运动对抗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欧阳雪梅的《新生活运动与明耻教战》(《湘潭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一文则从民族复兴的角度对新生活运动动员抗战的作用进行了肯定。而杨昌宴的《评旧道德与新生活运动》(《湘潭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一文却认为新生活运动是在复兴旧道德。这几篇文章应该说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认为新生活运动是针对共产党而发动,是为统治当时人民的思想而为国民党进行的政治服务。在这一方面,关志钢的两篇文章应该说有所突破,他的《新生活运动“反共论”析》(《深圳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对传统的说法进行了反驳,认为新生活运动具有两面性,反共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而唤起民族意识、对统治者内部进行道德整肃也是其目的;他的《新生活运动“复古论”析》(《江汉论坛》1998年第11期)则认为新生活运动除求助于传统道德、封建礼教外,也吸收了当代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制订了不少符合现代社会文明要求的生活目标和行为标准,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这两篇论文应该说对于新生活运动的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使得研究者要以全新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另外,金功辉的《民国时期中国文化重建的主体、目标、中介——新文化运动与新生活运动的比较研究》(《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采取了不同的视角,进行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另外,建国后,一些当年新生活运动的参与者写了回忆文章。黄锡章的《“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南昌文史资料》第1辑)一文,对新生活运动在南昌成立的原因及经过,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邓述坤《宋美龄—基督教—新生活运动》

(《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2卷第93辑)的文章则介绍了宋美龄怎样利用基督教进行新生活运动的推行;马毓英《“新生活运动”最初阶段的回忆》(《武汉文史资料》1987年第1辑)一文则从新生活运动的发起到其推行,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有价值的史料;刘清扬的《回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9卷第85辑)较为详细地介绍抗战时期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情况,同时对该委员会的工作情形也有详细的介绍;王宜估、萨福简《福建的“新生活运动”》(《福建文史资料》第12辑)则对福建新生活运动的组织概况、主要工作情况作了叙述,并列有福建新生活运动十年大事记,甚为详细。除此之外,徐树璜的《熊式辉踞赣十年的点滴见闻》(《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姚甘霖的《统治江西十年的熊式辉》(《江西文史资料》第10辑)两篇文章则介绍了熊式辉在南昌推行新生活运动的情况。这些在各地文史资料上发表的文章,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无一例外地认为新生活运动是反共的。

与此相应,台湾的学者对新生活运动也进行了一些研究工作。首先,他们编了一批有关新生活运动的史料集,如《革命文献》丛书中的《新生活运动史料》、近代史丛刊中的三本新生活运动的资料集及其他的一些著述中都有新生活运动的材料,这些材料虽然不完整,但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次,他们也研究出了一些成果。如谢早金的《新生活运动的推行》(张玉法编《中国现代史论辑》第8辑)一文,从整体上对新生活运动的推行从组织发展、宣传活动、推行情形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他的研究有别于国内学者,主要是从社会史角度进行研究;邓元忠的《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研讨会论文集》(上册),1984年12月)一文对新生活运动评价很高,认为“其意义,实涵盖蒋委员长当时的整个政治抱负,它被认为是当时解决国家基本问题

的最佳途径，它是组织全民的办法，它是委员长影响力与地方政治力量结合的形式”。^[30]该文分析了新生活运动产生的政治背景，新生活运动的目标及新生活运动对民众的组织，全部都是对其肯定的态度。而秦孝仪则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对新生活运动进行了研究，他在《中华民国社会发展史》（第三册）（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版）和《中华民国文化发展史》（第四册）（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1年版）中认为新生活运动是民族文化和道德复兴运动，并对它的影响和意义都充分肯定。从台湾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与大陆学者不同的是，他们给新生活运动以极高的评价，冠以各种美名，对其缺陷及最后的衰败结局则避而不谈，当然，对其的评价也不能称之为是客观公正的。

综观上述这些研究情况，不管是大陆学者还是台湾学者对推动新生活运动的研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这些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在研究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相当严重。相当一部分大陆学者都对新生活运动除其推行现代一些日常文明的生活习惯进行肯定外，其余都持否定态度。并且他们认为新生活运动的动机就是反对共产党的，是为了维护国民党对人民群众的统治的。基于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观点，无疑在研究过程中对新生活运动的评价肯定就有失偏颇，有的甚至得出了一些简单错误的结论。因此，大多数学者在论述新生活运动产生的原因时，也是简单地认为新生活运动就是在反共围剿这一前提下发起的。而台湾学者则相反，他们是从国民党自身利益出发，则对新生活运动给予较高的评价，而对新生活运动的缺点则根本不谈，因而也不可能对此作出正确的评价。

二、蒋介石是发起新生活运动的主要人物。而大多数学者并没有能够很好地论述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的作用，特别是对蒋介石构建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学者们并没有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有的学者则是从蒋介石的整体思想中谈论到这个问题，但也并没